

反戰・厭戰：戰鼓聲中的台北愛情故事 —川合三良小說〈婚約〉—

劉淑如

國立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摘要

目前有關在台內地人作家川合三良的作家作品研究尚不多見。三良曾以〈轉學〉〈某一時期〉〈出生〉〈婚約〉等作與周金波(〈志願兵〉)同獲首屆「文藝台灣賞」,其中〈婚約〉最獲好評。戰後葉石濤在引介〈婚約〉時,曾以其著眼於決戰下台灣的日本男女青年飽受苦難的樣貌書寫,加以全文「無一句話歌頌日本侵略戰爭」,主張其略帶反戰思想。然而,「反戰」與「獲獎」在太平洋戰爭已爆發的時代背景下,何以能同時並存?本文由此問題意識出發,主要聚焦於〈婚約〉,從戰時後方日常及前線日常與非日常之書寫、反戰・厭戰:擴張與縮小的抗拮、赤化・轉向與戰場經驗:兼論三良渡台前的經歷等視角,思考〈婚約〉的時代意涵。過程中並參照其他獲獎系列作,以及戰後三良的日本民主主義文學同盟運動、社會運動的參與動向及文學活動。結果顯示,作者乃隱約透過後方的幸福日常與身處前線者的身心受難書寫,試圖將戰爭殺傷力前景化。而投射作者自身經驗的赤化・轉向書寫,則導致文本小心翼翼包覆的厭戰思想,最終仍朝向配合時局的方向收斂,唯其亦極為克制。本文主張正是這種對反戰・厭戰欲言又止、對迎合時局僅透過個我經驗的方式而非著墨於對戰爭本身的評論的書寫姿態,構成了〈婚約〉的基調。

關鍵字：反戰、厭戰、川合三良、〈婚約〉、轉向

受理日期:2022年08月31日

通過日期:2022年10月25日

DOI: 10.29758/TWRYJYSB.202212_(39).0010

**Anti-War and War Weariness:
A Taipei Love Story During the Drums of War in
Kawai Saburou's novel *Engagement***

Liu, Shu-J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published on the works of the Taiwan-based Japanese author Kawai Saburou. Along with Zhou Jin-bo, author of *Volunteer Soldier*, Kawai was awarded the inaugural Bungei Taiwansho (Taiwan Literary Arts Award) for works such as *School Transfer*, *A Certain Time*, and *Engagement*. Of the three, *Engagement* was the most highly praised. After the war, Yeh Shih-tao noted that *Engagement* focuses on the suffering of young Japanese men and women, writing that it contains “not a single word praising the 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nd therefore takes a somewhat anti-war position. That said, how can “anti-war” and “award-winning” both coexist in a novel writte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Pacific War? This paper proceeds from this problematic, focusing on key tensions in *Engagement*: the contrast in the text between daily life and extraordinary events, the front lines and the rear; the antagonism between the expansive expression of war weariness and anti-war sentiment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constrictive social context on the oth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wai's communist turn and his ordeals on the battlefield. I also consider Kawai's experiences and thinking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and examine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Engagement*. Reference is made to other award-winning works, Kawai's postwar participation in the Japanese Democratic

Literary Alliance and social movements, as well as his anti-war and Taiwan writings. I show that Kawai foregrounds the atrocity of war by contras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suffering of soldiers on the front lines with the ordinary happiness of those on the home front. At the same time, Kawa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his turn to the left are projected into the writing, allowing him to introduce carefully concealed ideas about war weariness into the text, but only in an extremely restrained way. Forced to cater to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time, anti-war sentiment and war weariness were necessarily expressed on the level of the personal rather than the political. It is this constantly thwarted desire to speak that constitutes the prevailing tone of *Engagement*.

Keywords: anti-war, war weariness, Kawai Saburou,
Engagement, changing beliefs

反戦・厭戦：戦時下の台北ラブストーリー —川合三良の小説「婚約」—

劉淑如

国立宜蘭大学外国語文学学科 副教授

要旨

戦前の台湾文学の日本人作家作品研究のなかで、在台内地人作家である川合三良に関する研究は決して満足のいく状況ではない。三良は、昭和十七年に、「転校」「ある時期」「出生」「婚約」などの一連の台湾小説により、周金波とともに第一回「文芸台湾賞」を受賞した（周の受賞作品は「志願兵」）。なかでも注目されるのは、この時に最も評価された「婚約」である。戦後、葉石濤はこの小説を台湾に紹介する際に、「日本の侵略戦争を称える言葉は皆無」であり、「いささか反戦的な意味が汲み取れる」と述べている。だが、仮にこの発言が正しいとするならば、太平洋戦争のさなかに、なぜ「受賞」と「反戦」を両立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だろうか。本稿はこの問題意識から出発し、戦時下の銃後の日常と前線の「非日常の日常」や反戦・厭戦：拡張と縮小の抗いなどの視点から、「婚約」の時代的意味を追体験することを試み、「婚約」以外の受賞作や三良が渡台する前の赤化・転向・戦争体験及び戦後における三良の日本民主主義文学同盟運動、社会運動、文学活動なども参照しながら考察を行った。結果として明らかになったのは、三良が、戦時下の銃後の台北の日本人の幸せな日常生活を描くことで、戦争で別離や死を強いられた人々がいかに苦しめられたかを浮き彫り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の意味で、小説は疑いなく厭戦・反戦的な姿勢を示していたと言える。ただ、それと同時に、転向を声明した作者は時局にも配慮する方向に、小説の厭戦・反戦的思想を収束させていく姿勢をも示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反戦、厭戦、川合三良、「婚約」、転向

反戰・厭戰：戰鼓聲中的台北愛情故事 川合三良的小說〈婚約〉

劉淑如

國立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1. 前言

自八〇年代後期解嚴至今，戰前台灣文學的研究不僅呈現蓬勃發展之姿，無疑也已成爲一門顯學。對於台灣文學（史）的定義或範圍界定的討論，戰前早已眾聲喧嘩；¹戰後依舊百家爭鳴。²其中，垂水千惠認爲，由台灣人創作的以中文及日語寫就的文學、以及由在台日本人所創作的文學，皆爲「戰前台灣文學」。³類似垂水從打破民族藩籬出發的定義台灣文學的動向，亦可從中島利郎・河原功共編之《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的問世窺得端倪。⁴然而自解嚴及上述動向出現以來，已歷時二、三十載，相關討論卻仍有待進一步從對非主流日人作家作品的檢討來提升。目前較少受到關注的川合三良（1907—1970）的台灣文學即爲一例。三良出生於大阪市，爲家中三男，下有一弟一妹。其父於一八九五年渡台，接掌海運業，爾後以政商之姿往返台日。⁵另外，從三良在高中（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以下簡稱六高）入學前後曾發表許多台灣短歌，⁶以及其寫於戰後初期的散文〈美麗之島〉（〈美しい島〉，1949）中曾觸及兒時的台北見聞可知，⁷

¹王碧蕉(1942)「台灣文學考」、『台灣文學』第2卷第1号、台北：啟文社、pp. 21-24。黃得時(1943)「台灣文學史序說」、『台灣文學』第3卷第3号、台北：啟文社、pp.2-11。

²葉石濤(1997)〈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總序〉，收入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3，台北：遠景出版，pp.7-35。川村湊（1990）『異郷の昭和文學』、東京：岩波書店。葉石濤譯，垂水千惠著（1995）〈戰前的台灣文學——與日本的糾葛中透視〉，收入葉石濤編譯（1996）《台灣文學集①——日文作品選集》，高雄：春暉出版社，pp.21-29。

³葉石濤編譯（1996），垂水千惠前揭文，p.22。

⁴中島利郎・河原功編(1998)《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東京：綠蔭書房。（全五卷・別卷一）

⁵松尾教史(2009)「台灣時代における川合三良の文学作品——ある在台内地人作家にとっての皇民化政策——」、『Core Ethics』Vol.5、p.306。

⁶內海繁編(1973)『ひとすじの道——高田三良の作品とその生涯——』、神戸：高田良介發行、pp.140-141。

⁷內海繁編前揭書、pp.77-78。

三良幼時即曾住過台灣。六高時期，三良與內海繁等同學成立「窗詩社」，並發行詩歌誌《窗》(《窓》，1928—?)，⁸其基調大致不脫虛無主義、懷疑與頹廢之風。雜誌停刊後，三良進入京都大學就讀，在歷經一段虛無主義與頹廢生活後，轉而熱衷於馬克斯主義等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實踐。期間日本實施治安維持法，三良也遭到檢舉拘禁，在軍國主義的猖獗下，度過一段漫長的黑暗時代。⁹

三良於一九三五年再次渡台，進入父親設於台北的「川合名會社」。三良活躍於台灣文壇的期間並不長，¹⁰但卻於一九四二年以〈轉學〉(〈転校〉，1941年)、¹¹〈某一時期〉(〈或る時期〉，1941年)、¹²〈出生〉(1941年)、¹³〈婚約〉(1942年)等系列小說，¹⁴與周金波的小說〈志願兵〉(1941年)同獲西川滿主導的文藝台灣社所舉辦的首屆「文藝台灣賞」。另外，三良也在西川滿主編的版畫集《台灣繪本》(《台湾繪本》，1943年)中發表短歌及短文，¹⁵並以筆名「立川三夫」發表許多短歌。¹⁶戰後三良於岡山及但馬地區的兵庫縣高中任教，並改姓高田。¹⁷六〇年代，三良成為但馬地區民主文學運動的核心人物，晚年並曾從事環保社會運動。¹⁸

⁸《窗》發刊於昭和三年。內海繁(2007)「ひとすじの道——高田三良の生涯」、『燎原』第169号、京都：燎原社、p.6。

⁹內海繁前掲文。

¹⁰三良戰前在台文學活動始於1940年12月，止於1943年3月。參照內海繁前掲書、pp.180-183。

¹¹川合三良(1941)「転校」、『文芸台湾』第2卷第2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p.94-102。

¹²川合三良(1941)「或る時期」、『文芸台湾』第2卷第4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p.8-21。

¹³川合三良(1941)「出生」、『文芸台湾』第2卷第6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p.62-71。

¹⁴川合三良(1942)「婚約」、『文芸台湾』第3卷第4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p.71-80。後收入西川滿編(1942)『台湾文学集』、東京：大阪屋号書店、pp.220-237。戰後收入中島利郎・河原功編(2008)『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 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五卷、東京：綠蔭書房、pp.467-476。本文參考初出版本。另，本文中有關〈婚約〉的引文出自筆者自譯。

¹⁵內海繁編前掲書、pp.180-182、pp.240-241。

¹⁶中島利郎(2013)『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日本人作家の系譜』、東京：研文出版、pp.206-248。

¹⁷內海繁編前掲書、p.179。

¹⁸日本共産党兵庫県委員会(2011)「日本海岸(但馬・丹後)の原発計画くいとめた40年前の運動に学ぼう：日本共産党但馬地区常任委員中家貞雄さんに聞く(上)」、『兵庫民報』Web版、<https://hyogo-minpo.blogspot.com/2011/08/40.html>

三良的台灣小說具濃厚自傳色彩，作品多聚焦於日人，〈婚約〉亦不例外。戰前有關三良小說的討論多屬作品簡評，例如前述「文藝台灣賞」的初選委員濱田隼雄、龍瑛宗及西川滿在遴選討論時，龍稱其「作品雅致，但缺少氣魄」、¹⁹濱田認為其小說平淡中見紮實，²⁰「唯力道稍嫌不足，似乎未完全發揮」。對此，西川也附議其小說似乎寓有深意。另外，龍與西川二人都認為〈婚約〉為三良前述系列小說中之最，但並未闡述其原因。²¹

戰後有關三良文學的評價首見於《窗》同人。例如內海繁評論其短歌作品「與戰爭禮讚無緣」；²²內海繁、安本久米雄認為小說〈婚約〉在文學只准歌頌戰爭的年代「以極為克制而周到的方法描寫戰爭悲劇，誠屬可貴。」²³類似內海繁「與戰爭禮讚無緣」的評價見葉石濤。葉認為書寫決戰下在台北的日本青年男女飽嚙生離死別之苦的〈婚約〉因全文「無一句話歌頌日本侵略戰爭」而「只描寫決戰下日本人男女的愛戀」，堪稱為一「紮根於生活現實」之作，眼光與立場獨特，「帶有一丁點兒反戰的意思」。²⁴另外，松尾教史從與皇民化政策的關聯之角度檢視三良的台灣小說，指其之所以僅聚焦日人，乃因日人所受苦難過大，故可將其歸入無牢固的「皇民」概念之作家。最後，中島利郎透過對三良的短歌與歌評的考察指出，三良的台灣文學不僅與頌揚戰爭無緣，更帶有「憤怒」與「反抗」的意志，而相關論述也引用前述葉針對〈婚約〉的簡評。

綜上可知，內海、安本、葉、中島等人皆指出〈婚約〉與歌頌戰爭無緣的面向，其中葉與中島主張〈婚約〉具有反戰意涵，唯相關評論僅寥寥數行，非針對〈婚約〉之專論，故無法具體彰顯小說的反戰

¹⁹濱田隼雄・龍瑛宗・西川滿(1942)「鼎談」、『文芸台灣』第4卷第3号、台北：文芸台灣社、p.30。

²⁰濱田隼雄・龍瑛宗・西川滿(1942)「鼎談」、p.31。類似評價如黃得時稱其作品「筆致老練，運筆自然，作品骨架完整，唯缺乏新鮮感與銳氣」。黃得時(1942)「輓近の台湾文学運動史」、『台湾文学』第2卷第4号、台北：啟文社、p.10。另，楊雲萍稱三良「資質篤實，值得期待」。楊雲萍(1942)「台湾文芸界この一年」、『台湾時報』276号、台北：台灣時報社、p.57。

²¹濱田隼雄・龍瑛宗・西川滿(1942)「鼎談」、p.31。

²²內海繁編前揭書、p.154。

²³內海繁編前揭書、p.137。

²⁴葉石濤編譯前揭書、p.157。

與厭戰的時代意涵。其次，松尾論文著眼於皇民化意識之面向，其中雖也觸及三良渡台前·返日後的社會運動之參與經歷，但僅概述性提及，既未就其與三良文學的影響關係進行辯證，也未就〈婚約〉文本做深入分析。尤其《窗》誌雖已遺失，但從該誌同人與三良親友於三良逝世後的追悼文中可見許多三良思想的相關記述；另外從戰後三良的社會運動與台灣書寫及反戰書寫中亦可窺知其核心思想。這些都有助於理解三良在戰時下的文學書寫。

接著本文將以上述先行研究為基礎，聚焦於〈婚約〉文本，從戰時下後方的日常生活書寫、野戰醫院中的日常與非日常、反戰·厭戰：擴張與縮小的抗拮、赤化、轉向與戰場經驗：兼論三良渡台前的經歷、戰後三良的日本民主主義文學同盟運動與社會運動參與動向及反戰書寫、台灣書寫等視角，思考〈婚約〉的時代意涵。過程中並將參照三良其它獲獎作品。尤其〈婚約〉等作與周金波的〈志願兵〉同時獲頒由西川滿主導的首屆「文藝台灣賞」，就時代背景而言理應與反戰·厭戰無緣。關於這一點，本文也將從作者的赤化與轉向之生命經驗、寫於〈婚約〉之前的台灣小說及散文以及三良與西川滿、與《文藝台灣》雜誌的關係等視角，加以考察。

2.台北與相親：戰時下後方的日常生活書寫

前已提及，三良的作品具濃厚自傳色彩，〈婚約〉中主角被軍隊徵召的內容也與三良的經歷重疊。三良第一次被徵召是在一九三四年時，於隔年「除役」；第二次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前往中部戰線，隔月在江蘇省羅店鎮附近負傷住院，於隔年「除役」。最後一次於一九四三年二月進入台北第一連隊，隔年九月「晉升陸軍軍曹」，直至日本戰敗。²⁵〈婚約〉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一月，約莫介於三良第二次「除役」後至第三次受徵召之間。而〈婚約〉中的主角負傷後住進上海江蘇野戰醫院等情節，也與三良的境遇重疊。

〈婚約〉由三幕構成，第一幕描寫一對在台日本男女青年在台北

²⁵內海繁編前揭書、p.291、pp.178-179。

相親的經過。第二幕場景拉到上海野戰醫院，內容由病床相鄰的在「內地人」傷兵澤田與「我」的對話構成。至此可知，相親經過的闡述者就是相親情節中的男主角澤田，而「我」則是這個台北愛情故事的傾聽者。在此幕中，澤田告訴「我」他與酒井（貞子。以下統稱酒井）在相親後曾短暫交往，不久受徵召，臨別前，與酒井許下口頭婚約。接著小說展開第三幕，此即在澤田與「我」的對話過後，「我」因傷勢拖延須被遣返「內地」，澤田便託「我」代為前往探視酒井。就在「我」見到酒井並轉告她，澤田雖曾負傷，現已復原並重新活躍於前線時，酒井卻回，數日前早已接獲澤田戰死的通知。小說遂在「我」對於酒井此刻展露的莊嚴崇高的姿態與充滿希望的眼神的感悟中劃下句點：「瞬間我清楚地了解到她對澤田用情之深。對我而言，她已是高貴之身，不容侵犯了。」（〈婚約〉p.80）

如前所述，〈婚約〉中有關接受徵召及「除役」等情節乃與作者的經歷重疊，唯作者並非將其自身經歷集中投射於小說中特定一位人物，而是投射在多位登場人物中。而透過〈婚約〉對於澤田在接受徵召後的敘述所彰顯的，則是在此之前的澤田與酒井的相親過程敘述中所呈現的戰時下後方即台北歲月靜好的日常生活景觀。故事從澤田與酒井不約而同前往台北畫廊欣賞畫展的場景開始。兩人目光交會時，酒井感到與澤田似曾相識，她並憶起日前曾不經意在父親一只存放貴重物品的盒子中發現一張放大的男子全身照，而眼前的男子正是照片中人。正值適婚年齡的酒井瞬間領悟到何以平日對油畫不甚關心的父親今日會邀她來看畫，此即一場由婚姻掮客A桑分別與酒井雙親及照片中的男子澤田商量後，瞞著酒井秘密籌畫的在正式相親前的「窺看」（酒井及其雙親）計謀。接著小說便描述起酒井與澤田對於「被窺看」與「窺看」後的後續發展的不快等內面感受。

小說描述酒井對於自己被偷窺感到羞愧且憤怒，故萌生想給父母及A桑一記反擊的念頭，唯受限於澤田的剛毅外表與因此帶來的壓迫感，終未能將此念頭付諸實現，反倒陪同演戲，假裝自己正專心賞畫。酒井並暗中決定，若澤田對「大人」的指示言聽計從，自己將拂袖而去，且無論之後澤田再怎麼央求A桑，她也不予理睬。結果澤田在見

到酒井後，立刻請A桑介紹，眾人便一同前往餐廳。接著小說又描述澤田雖仰慕酒井，卻對須接受酒井父母「檢驗」感到愚蠢，也對整齣戲感到厭惡。相親的最後一幕則是落在澤田於散會後獨自走向博物館，一路上欣喜若狂，並決意追求酒井的喃喃自語中。

如此的相親過程雖屬刻意的營為，帶點「非日常」的味道，但相較小說隨後切入的澤田向「我」憶及這段往事時的空間場域即上海野戰醫院、以及之後的敘事所影射的戰爭帶來的人身自由限制的聯想，反倒顯得閑適與從容。關於這一點，另外也可從小說在提到女子即酒井的父親在向A桑問起澤田嗜好時的描寫中窺知：

「(前略)當A桑前來跟女子的父親商量澤田的事時，女子的父親即表現出高度的興趣。他認為以後的年輕人一定要有個一技之長才行。而當他看到照片中的男子留的是短髮時，不禁好生感動，因為時下的年輕人不但大多喜歡留長髮，還偏好抹上髮油。當女子的父親問起澤田的興趣時，A桑回說，因為澤田是劍道三段，所以劍道應該可以算是其中之一。A桑還說，澤田也是吹豎笛的好手。由於A桑的嗓門過大，在一旁彈鋼琴的女子也聽得一清二楚，心想難不成這年頭真有年輕人喜歡吹豎笛？」(〈婚約〉p.74)

從上述這段與戰爭相關場域截然不同的大後方的庶民日常生活風景中，顯然可看到年輕人對於流行、時尚的追逐與對於音樂、運動等嗜好及興味的追求。這份閒情逸致與生活餘裕，在寧靜安穩的日常生活中，是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然而，對身處戰爭前線的人而言，如此平常的日常生活，無疑是不可多得的奢望。反之亦可說，大後方的日常生活確幸，更加映襯出(尤其是非自願性)置身於戰爭前線此一非日常生活場域中的人們內心的惆悵與絕望。

作者對於後方「日常」生活的從容有餘之書寫，另外也出現在對酒井家世背景的敘述中。作者提到，經營鐵工廠的酒井父親因缺乏學歷而深感自卑，因此即使家中並不甚寬裕，仍讓兩個兒子到東京讀大學。其中哥哥攻讀美學，之後當電影導演，數年前還為了拍攝一部以阿里山為背景的大型電影而衣錦榮歸。「當時台北車站前還擠滿許多前來迎接的人群，眾人擠來擠去只為看一眼同行的女演員。」(〈婚約〉p.73)得以任性追求自己志趣的哥哥、為一睹電影明星風采前往追星

的有閒人。作者如是呈現「日常」生活從容有餘之風景。

另外，作者在描述投射其自身經歷的酒井家的弟弟時，雖稱其上大學後曾因參與左翼運動被捕，所幸涉入不深，立誓轉向後便獲減刑，唯自此健康欠佳無法上學等「日常」中的「非日常」事件，但最終弟弟回歸平凡生活，進入父親的鐵工廠工作。（〈婚約〉p.73）作者正如是藉由後方的「日常」，彰顯前線的「非日常」意象。同時，作者也透過「相親」、「約會」／「交往」、到澤田受徵召後與酒井許諾婚約、再到躺在野戰醫院中的澤田表達自己並不想活著回去的立場之激動、以及對於和酒井許諾婚約一事因怕耽誤對方而懊悔不已的一連串歷時性敘事，將戰爭導致的具負面意涵的「非日常」的殺傷性前景化。

3. 婚約與戰爭：野戰醫院中的日常與非日常

相親故事告一段落後，小說場景即切換成上海一帶的野戰醫院中相鄰的兩個病床上的日本青年傷兵，即澤田與「我」的對話現場。原本素昧平生的兩人因戰爭而有了交集，因為一如「我」所言，「在這種時候，大家都會想分享彼此家裡的事、自己的事，澤田也不例外。他就是在此情況下愉快地」告訴「我」關於他未婚妻的事與「相親的經過」。（〈婚約〉p.75）如是，在上海的野戰醫院這個異地、且還是廣義的戰場的這種「非日常」空間，²⁶兩個日本青年產生了緊密的連結。接著作者更透過兩人對話帶領讀者進入〈婚約〉的核心議題，此即由澤田與酒井的婚約所象徵的身為人對於平凡幸福的追求之「日常」與受戰火波及以致被迫脫離平凡生活常軌的「非日常」之間的衝突、矛盾及由此而生的內面糾結與鄉愁。

文本提到，澤田在接受徵召前，曾與酒井短暫交往，「這一別，使兩人的關係更加穩固」。澤田堅信這並非相親使然，而是天意，且「雖是很平凡的朝著結婚邁進的過程，但僅僅只因她在台北，就足以令」澤田「感到欣慰及有所依靠」，對此澤田「來到戰爭前線有很深的感觸」，

²⁶ 板垣直子也指出，戰場與野戰醫院既是兩個獨立空間，也指涉同一空間，且有時野戰醫院為戰場的延長，是士兵戰場生活的一部分。板垣直子（1943）『現代日本の戦争文学』、東京：六興商会出版部、p.146。

因為「再怎麼辛苦，只要想到她」，澤田便會提起精神，「彷彿看見一線光明」。(〈婚約〉p. 76)緊接著小說至此所營造的「有了來自後方的溫馨支援，前線就能精神抖擻地作戰」的後方與前線同心齊力的意象，卻在接下來的澤田與「我」的對話進行中，出現劇烈的心境轉折：

「只是……，此時澤田突然嚴肅地說道：

——真希望我沒遇見過她。要是一開始我就拒絕相親，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一想到一個女人為了一個約定便守著一個明天可能死去的男人，就令我難受。

——但你對她的心意應該遠比承諾還堅固吧！況且你當時之所以不得不跟她打招呼，是因為你們很有緣。

——我意志薄弱，這是事實。真應該先解除婚約再入營的。

——但是若站在她的角度來看，事情有那麼簡單嗎？況且兩人若是真心相愛，又何必拘泥於形式呢？

——不瞞你說，在確定要接受徵召入營時，我跟她提出了分手，但她怎麼也不肯接受，甚至還說，若我不反對，在我入營之前，兩人可以先把婚事辦一辦。於是我倆就做了口頭約定，但沒多久我就入營了。現在想起來，真不該說那樣的話，因為或許對方是顧慮到若她答應分手，將會對不起我這個即將要出征的人，所以才給出口頭承諾。

——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怎麼想。其實你只要相信她還在等你就好了，除非你不信。

——（澤田）就是這樣我才痛苦。

——看來你雖痛苦，卻還抱有一絲希望，這不也很好嗎？

——這種例子應該很多吧！到底拒絕她是好還是不好，我不知道。話說回來，為了這種事情煩心，大抵是奢侈的事。

話畢，澤田抬頭仰望天井。我原本以為他是傷口犯疼，沒想到這時竟從他的側面發現他臉色大變，沒多久他就怒氣沖沖地回過頭來對我說：

——但是，我並不想活著回去！

澤田當時全身挺得僵直，眼睛瞪得斗大。(後略)」（〈婚約〉pp. 76-77)

儘管澤田痛苦之餘突發出「不想活著回去」的必死決心之語，但全文除此外並不見其它如頌揚戰爭或批判敵方等言論，而是著眼於澤田與酒井在澤田「應召入伍」前的相親經過與互許婚約之背景、澤田在

前往戰場後對於與酒井互許婚約的複雜心境、以及酒井在得知澤田戰死後強忍悲痛的堅毅表現。過程中並置入戰線後方從容的日常生活，以及透過酒井家的次子一角置入作者的左翼與轉向經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婚約〉中曾參與左翼運動之後轉向的是酒井家的次子；而表明對征戰誓死如歸的則是澤田。若作者旨在透過此言，形塑拳拳服膺於戰事的誓死如歸者，則此角由酒井家的次子來擔任應更具說服力。是否如此將與作者未嘗真正消逝的左翼思想相牴觸？由此反而可看出作者間接對戰爭提出反命題的姿態。如是，則「我並不想活著回去」一語反倒顯得有些僵硬、唐突。

尤其小說中的「相親」、「婚約」等乃屬於「日常」生活中的幸福／「高潮」事件，這使得澤田「不想活著回去」背後的不幸與原有幸福之間的距離加大。在此之前，澤田的思維只停留在軍旅生涯唯有仰賴後方與未婚妻的精神支援方能振作的這種對於戰爭只能逆來順受、自我消化的消極層面。但到了「不想活著回去」的「表白」時，原本消極的逆來順受與自我消化卻出現劇烈的轉折。作者正是意在透過澤田「誓死如歸」的「表白」與後方「日常」中的幸福事件、澤田揣測酒井因同情自己才許下婚約進而為酒井感到不捨、澤田懊悔自己因意志薄弱而未在入營前與酒井解除婚約、以及最後澤田想到若酒井對自己是真愛，自己將更加痛苦的多層次描寫，呈現戰時下生活主體身心受難的處境，藉此間接傳達、流露厭戰之立場。

不過，〈婚約〉發表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月餘，此前三良已有兩次戰場經驗，並發表了同樣投射其戰傷經驗的小說〈出生〉。且如後所述，在〈出生〉中，三良雖控訴戰爭傷痕，也提出符合時局所需的理想日台人形象；在〈某一時期〉中，主角歷經左翼受挫後轉向，並透過來台沉澱堅定轉向信念；在〈轉學〉中，三良也透過「在台內地人」主角在「內地」經歷「內台融合」（實作）受挫後，主張「生蕃也是了不起的日本人」之書寫，²⁷呼應中日戰事吃緊的局勢下在台急遽升溫的

²⁷川合三良（1941）「軫校」、p.97。當時皇民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展開。內海繁與安本久米雄也強調閱讀此作時須考慮到時代制約。內海繁編前揭書、p.137。

皇民化運動。²⁸由是，〈婚約〉中澤田「不想活著回去」一語，或為轉向（理論）後的三良在某程度上的妥協（實作）。

〈婚約〉發表時，中日戰爭已歷時四年多，日本亦出版不少戰爭文學。在與三良同樣具有實戰經驗的作家中，以出版《麥田與士兵》（《麦と兵隊》）《大地與士兵》（《土と兵隊》）（以上 1938）、《花與士兵》（《花と兵隊》，1939）等「士兵三部曲」的火野葦平（1907-1960）最為知名。²⁹火野的作品之所以大受歡迎，³⁰不僅因其為「來自第一線士兵之報告、來自在櫛風沐雨與兵馬倥傯中不知明日生死的前線士兵堅韌的生命記述」，³¹也與其作品散發「盡忠赤誠之光」有關。³²當時總督府也在台製造「名譽的戰死」等陣中美談以宣揚「赤誠奉公」精神，³³而此實為武士道精神之展現，為戰時下必備的國民精神。澤田〈不想活著回去〉一語，可說呼應了當局對理想戰士典型之期待。

其實，火野與三良在大學時代都有過因參與社會運動、左翼運動遭捕並轉向之經驗、也都有過戰地經驗與書寫戰地生活所感的習慣與經驗（當時士兵都有寫日記或信的習慣。³⁴）。而〈婚約〉中澤田「不想活著回去」的表白、透過澤田與「我」的對話以刻畫前線士兵掛念後方等思鄉心緒之書寫，也見於火野《大地與士兵》。³⁵其次，〈婚約〉中前線戰友分享家中瑣事等親密關係之書寫，火野《花與士兵》一書也有著墨。³⁶

²⁸皇民化實施對象也包括原住民，內涵包括住宅「改良」、於「蕃社」建神祠、普及「國語」等，以期收其報日人「鴻恩」之效。上田光輝（1939）『皇民讀本』、基隆：淨土宗青年聯盟、pp.65-66。

²⁹從川柳「事變下的人氣 葦平一人獨占」可知火野在當時的人氣。大澤貞吉（1941）「川柳隨筆 葦平氏と河童」、『川柳国姓爺』、台灣：台灣川柳社、p.8。

³⁰火野相關作品版稅收入不僅為當時現地軍人中第一，還打破日清及日俄戰爭、九一八與上海事變等記錄。台灣婦人社（1939）「時の話題 ペン従軍作家は一体どの位稼ぐか」、『台灣婦人界』、台北：台灣婦人社、p.100。

³¹燕城（1938）「小感」、『竹鷄』第9卷第12号、台中：竹鷄吟社、p.3。

³²台灣語通信研究会（1939）「歲暮漫言」、『語苑』32卷12号、台灣：台灣語通信研究会、p.66。

³³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1940）「陣中美談 輝く荒鷺精神——畏くも上聞に達す」、『輝く日の丸』、台北：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pp.4-7。

³⁴火野葦平（1938）『土と兵隊』、東京：改造社、p.17。

³⁵火野葦平（1938）『土と兵隊』、16、21、pp.45-47。

³⁶火野葦平（1939）『花と兵隊』、東京：改造社、pp.77-84。

火野曾於一九三九年訪台，³⁷期間曾會見西川滿，並撰文祝賀其主導的《華麗島》誌的創刊。根據該文，兩人的結緣始自西川寄贈自家出版書籍給前線的火野，³⁸可見西川當時頗為關注火野。而三良當時也參與西川《文藝台灣》的創刊（1940年，台灣文藝家協會時期，前身為《華麗島》），並常在家中與西川討論雜誌經費與編輯事宜，³⁹且其作品也大多發表於該誌。加以從〈婚約〉書寫的前線戰友的互動與情誼、戰士的內面葛藤、鄉愁及戰士赴死的心志、後方的堅毅姿態等與火野的戰爭文學連動的角度觀之，在此並不能排除在三良的戰爭文學創作背景中，存在對於與其有類似經歷的火野的戰爭文學的關注、以及西川與火野的交流所帶來的刺激。另根據板垣直子的考察，當時描寫野戰醫院的戰爭文學內容主要書寫受傷經過、心境、鄉愁等。⁴⁰就此意義而言，〈婚約〉亦可回收到當時日本戰爭文學中的「實戰者作品」、「野戰醫院作品」等系譜。⁴¹唯儘管如此，三良的戰爭文學仍有其獨特性，就〈婚約〉而言，此可由澤田「不想活著回去」的表白過後，小說卻及時「轉向」的書寫策略中看出。

4.反戰・厭戰：擴張與縮小的抗拮

就在澤田向「我」傾吐他對於明知難以實現幸福願望，卻仍在從軍前與酒井許下婚約一事感到懊悔、痛苦與憂心後，突然激昂地表明他「不想活著回去！」後，作者卻未循此轉折發展，反而改從「我」的立場寫道，「他平常說話時，眼神看上去彷彿在瞪人，教人難受，但仔細一瞧，卻又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婚約〉p.77）如是收斂起方才的激昂敘事。而小說也隨即敘述起澤田來台前在京都求學的往事，內容提到澤田在與同學結束聚會後遇見算命師，該算命師對於澤田未來妻子的描述及預測準確的情節。小說並將場景拉回相親過程中澤田

³⁷大澤貞吉前揭文、p.9。

³⁸火野葦平（1939）「華麗島を過ぎて」、『華麗島』第一号、台北：台灣詩人協會、pp.5-7。

³⁹西川滿（1973）「大きな蔭」、收入內海繁編前揭書、pp.239-241。

⁴⁰板垣直子前揭書、pp.146-147。

⁴¹板垣直子前揭書、pp.69-161。三良另一篇具描寫戰爭傷痕面向的「出生」則可回收到當時日本戰爭文學中的「戰傷文學」系譜中。板垣直子前揭書、pp.161-163。

對酒井的觀感，似乎意在抽離方才在澤田與「我」的對話中觸及的戰爭使人身心受難的敘事。此一書寫策略使得小說中若隱若現的厭戰與「玉碎」思想雙雙都受到了抑制。直至小說尾聲「我」因傷「除役」後接受澤田請託前往探視酒井，對於酒井在告知「我」她已接獲澤田戰死訃報後顯露的神情姿態的觀感描寫處，作者對戰爭的潛在憤懣與對時局的適度迎合之立場才再度浮現。對此內海繁指出，〈婚約〉「雖是描寫戰爭時代的作品，但在戰爭禮讚外其餘皆不被允許的時期，它以極為抑制而周到的方法書寫戰爭的悲劇，這一點很可貴。」⁴²如是，〈婚約〉中對於厭戰的表態乃是以一種欲言又止、一擴一縮的相互抑制的方式呈現。而如此的書寫方式也透過「我」在得知澤田的未婚妻確實就是自己昔日暗戀的酒井後，酒井對於戰場中的「我」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的書寫、以及透過小說尾聲處當「我」前往探視酒井，看到酒井在提到澤田戰死時的反應、還有「我」的感受等過程之書寫，小心翼翼地呈現。

就在澤田請「我」前往探視其未婚妻時，「我」終於確認其未婚妻正是「我」在「內地」讀高中時的同班同學的妹妹。且「我」與酒井不但共事過，還有過曖昧關係。自此故事主軸轉向「我」與酒井的過往、酒井對於來到前線的「我」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的敘事上。小說先是澄清「我」與酒井的曖昧關係，稱此只是建立在「我」對酒井的單相思上。作者並開始形塑性格優柔寡斷的「我」與冷漠、孤傲、有潔癖的酒井。小說尾聲更朝向酒井對戰死澤田的深情流露所象徵的理想的忠貞與堅毅的後方的精神象徵收斂之。以下即為小說結尾處，「我」受澤田請託前往探視酒井（貞子）時，兩人互動的場景描寫。

「總之澤田的傷沒什麼大礙，現在人應該也已精神抖擻地在前線打仗了。話畢，我卻發現她眉頭深鎖，嘴角劇烈地抖動，似乎懷疑我對她有所隱瞞。但在一陣沉默過後，她的表情卻又突然轉為失望與氣餒。

貞子回我說，澤田已經戰死了，她早在三天前就收到通知了。而當她說出這個教人難以置信的消息時，眼角却一動也不動。此時她的臉上已不見方才的

⁴²內海繁編前揭書、p.137。

憂鬱，蒼白的臉龐看起來既莊嚴又崇高，嘴角還隱約浮現一抹明亮的陰翳，那深邃明亮的雙眸，也散發出溫暖的光芒。

霎那間，我清楚地了解到她對澤田的用情之深。

對我而言，她已是高貴之身，不容侵犯了。」(〈婚約〉p.80)

如是，由作者安排酒井對於澤田的戰死從失望與氣餒而至顯露神聖莊嚴的姿態此一書寫策略可知，小說既間接傳達了厭戰的立場，也不忘描繪酒井所象徵的理想的帝國女性的堅毅形象。作者正是以此做為對於小說中澤田與酒井的婚約所象徵的戰時下日常生活主體的幸福生活破局之回應。在此同時，因負傷且傷勢有長期化之虞而遭遣返「內地」的「我」，也徹底被排除在戰死的澤田與忠貞堅毅的酒井的組合之外。作者所採取的正是這種在一擴一縮之間所隱約透露的厭戰・反戰立場的書寫策略。而此種厭戰的思想，另外還可透過酒井對於來到戰場之後的「我」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的小說稍早的敘事中窺得端倪：

「原本快忘掉的女人，來到戰地後不知怎地竟經常想起。每每在前線趁著空檔擦拭槍械時，就會不經意想到她。有時累到打嗝睡或盛飯時，她的影子也會掠過我腦海。原以為這是浮雲遊子在觸景生情時難免會有的鄉愁，不料後來她竟時常出現在我的夢裡，而夢中的背景大多是台北。其實我也想過，自己或許是愛著她的。每每想到此，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而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潛意識中對她的情感也真的愈來愈強烈。就這樣，她的形象逐漸在我心中被理想化與美化，而夢裡的她也開始跟現實中有所不同。對我來說，她是即便在激烈的戰況中也會不經意出現在眼前的一個夢。通常那時我特別會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心情打量著自己，並重新意識到自己竟然至今仍毫髮無傷活著的喜悅，同時內心也會湧現一股子彈絕對不會射中自己的自信與勇氣，而這種心理跟此時可以毫無遺憾地死去的澎湃熱情，幾乎是相同的。」(〈婚約〉pp.79-80)

引文中「我」的台北情結在澤田於上海野戰醫院向「我」提到僅因酒井在台北便令他欣慰時便已顯露。此一情結也出現在〈轉學〉〈某一時期〉〈出生〉中。⁴³〈轉學〉中的主角洋一出生於台灣，父親在日

⁴³川合三良(1941)「転校」、p.102。

本治台後隻身來台，是事業有成的洋貨商。好景不常，父親在洋一八歲時事業受挫，妻子逝世，便將洋一帶回「內地」。洋一本對「內地」懷有憧憬，轉入小學後屢被同學蔑稱為「生蕃」，遭遇「內台融合」的挫折，⁴⁴於是對「原鄉」失望，並對台北產生鄉愁。某日洋一在夢中回到台北，他看見熟悉的街道與水田、白鷺絲、鐵路、火車、窗外遠山、呼喚自己的男孩及奔向自己的母親。最後洋一並未搭上火車而只是望著遠去的列車背影嚎啕大哭。⁴⁵〈某一時期〉中的主角洋一也在「內地」受挫（左翼運動）後轉向，並在旅居台北的叔父的勸說下來台，在台找到內心的平靜。⁴⁶〈出生〉中的台北則是主角洋一從戰場負傷歸來後溫暖地接納、感謝及陪伴他治癒戰爭傷痕之地。⁴⁷而回到上述〈婚約〉引文亦可發現，台北、酒井、後方三者間界線模糊，且其之所以被「我」理想化到近乎失真，無非是在戰場這個「非日常」空間的強烈對比下所致。即，作者乃是透過澤田與「我」對台北、酒井、後方深深眷戀的這種反向操作的書寫策略，間接傳達厭戰思想。

然而，在引文的最後，作者卻又再度以至今與未來都能安然活著的喜悅及自信、勇氣的心理之與此刻死而無憾的澎湃熱情幾乎相同的修辭，將前面小心翼翼包覆的反戰與厭戰思維，朝向配合時局賦予理想日人應展現的視死如歸精神的方向收束。⁴⁸正是這種對反戰・厭戰欲言又止、對於配合時局也僅「微表態」而非從正面頌揚的態度，構成了〈婚約〉的基調。另外，無論是戰死的澤田或負傷的「我」，兩人最終與酒井（與台北及後方的意象連結）都處於破局狀態（理想戰士須視死如歸）。而最終堅強承受這殘局的，則是酒井這位後方女性。此種頌揚後方女性的堅毅之書寫，雖與當時許多戰爭協力的書寫中讚揚送親人上戰場的女性的堅毅、或歌頌親人戰死後的後方女性的表現之

⁴⁴松尾教史前揭論文、p.308。

⁴⁵川合三良(1941)「転校」、94-102。

⁴⁶川合三良(1941)、「或る時期」、p.21。

⁴⁷川合三良(1941)、「出生」、pp.62-71。

⁴⁸尾崎秀樹在提到日本在台實施的皇民化的主旨時指出：「……日本統治者實際希望的皇民化不是台灣人作為日本人而活著，卻是台灣人作為日本人而死去，成為優秀的日本人也就是作為日本人而死，……作家們不准許從此一主題逃避。」（初出尾崎秀樹(1971)「決戦下の台湾文学」，重引自陳明台〈論戰前在臺灣的日本人作家和作品〉，收入(1997)《臺灣文學研究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pp.145-146。

堅毅之書寫有幾分相似之處，⁴⁹但若對照起在澤田「應召」前，酒井從容地在家中彈琴、假日與家人外出賞畫、相親約會等，結局處的酒井無疑落寞許多。如是，〈婚約〉明顯意在透過幸福與落寞的前後對照，以呈現其間的落差與無奈。

另外，小說中對於反戰・厭戰欲言又止，對於迎合時局也極為克制的書寫策略，也可從戰時下日本文壇整體流露的大時代下不得不然的消極性來理解。關於此，岡田三郎在中日戰爭爆發兩年餘評論日本時下的戰爭文學時，即以當時日本文壇的動向為例，評價時下文學對於時局的批判精神多屬不得不採取消極之道因應的這種欠缺積極性作為之物，而這也構成了當時日本文學的基調。⁵⁰〈婚約〉中極為壓抑的「縮小」意識大致亦不脫此調性。另外，三良曾參與過左翼運動，也曾誓言轉向，並有過戰場經驗。欲進一步理解〈婚約〉中這種欲言又止的「縮小」意識，則也必須從上述三良的生命經驗來理解。

5. 赤化、轉向與戰場經驗：兼論川合三良渡台前的經歷

前已提及，三良在京大期間熱衷馬克斯主義。具體而言，三良在當時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連盟、反帝連盟，⁵¹在遭到檢舉與拘禁、⁵²誓言轉向、獲釋後，被派往間島「服役」，期間仍受監視。⁵³另外，中島利郎在論及三良以滿洲從軍經驗所吟詠的短歌時也指出，三良在軍中飽嘗孤單、困惑與死亡恐懼。⁵⁴中島並認為從三良的小說〈第一個早晨〉(〈最初の朝〉)可知，⁵⁵三良當時除了憎惡軍隊軍人、對其產生反感與輕蔑感外，也早已有「抵抗—反抗心。」⁵⁶

三良的厭戰思想，從其散文〈三橋町墓地〉(1941年)也能窺得端

⁴⁹吉村敏(1944)「たしかな裏づけ：山の勇士の遺族を訪ねて」、『新建設』3卷9号、台北: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pp.40-44。

⁵⁰岡田三郎(1939)「戦争文学の行方」、收入ゆまに書房(2007)『文芸時評大系 昭和篇I』第十六卷 昭和十四年、東京:ゆまに書房、pp.390-392。

⁵¹松尾教史前掲論文、p.307。

⁵²三良被捕時間約於1932年。參照內海繁編前掲書、p.266。

⁵³中島利郎前掲書、p.212。

⁵⁴中島利郎前掲書、pp.213-214。

⁵⁵內海繁編前掲書、pp.1-43。

⁵⁶中島利郎前掲書、p.215。

倪。文中三良透過在御成町附近墓地的觀察如墓碑形狀、大小及銘文，發出對戰爭導致生命流逝的感嘆。其中古墓碑旁的新墓碑群尤令他坐立不安；詳讀碑文想像其家人掬淚情景亦令他傷感。與乃木希典之母及明石元二郎之墓的「相遇」更令他發出對「事變」以來「名譽戰死者」新墓不斷增加的感慨。如是，透過墓地的日常散策引發的有關死亡與戰爭的聯想，令三良對戰爭發出一種「將身邊日常的厭戰感情血肉化的」、「和平主義式的、詠嘆的」感慨。⁵⁷尤其三良曾在寫給六高時代同人的書信中提到，與《窗》誌同人的交誼成為決定他人生的重要轉捩點，在他「傷痕累累」的過去，某部分並未消逝，唯（相關思想作品）「恐怕無法發表，只能帶進墳墓。」⁵⁸這段「自述」極有助於理解三良發表於戰時下的作品。而〈婚約〉中顯得有些刻意穿插的關於赤化與轉向的敘事，相對於那些無法發表的內容，不僅不會引發問題，甚至可能形成某種「保護傘」：

「次男在台北的高等學校唸書時，個性認真穩重，人聰明、成績也好，父親對他期望很高。但上大學後不知怎地，竟有赤化的跡象。母親一聽說他被拘提後差點氣絕，還發燒昏睡了三天；父親則是大老遠跑到東京為他四處奔走。幸好他涉入不深，事後也哭著發誓說會轉向，這才獲得緩刑。但後來他不但學校讀不成，身體也變差，有一陣子甚至遊手好閒。現在他在父親的鐵工廠裡上班，負責會計的工作，還算是認真。總之可確定的是，父親對這兩個好不容易才從大學畢業的兒子都很失望。」（〈婚約〉pp.73-74）

在〈某一時期〉中，亦可見由「赤化」「監視」「轉念」「重生」等字眼構築起的由左翼到轉向的過程與宣言敘事。疑似就是三良化身的主角洋一在大學畢業前突然被退學，受到精神打擊的洋一常懷疑自己被監視。某日洋一夢見自己化身為沉睡中嬰兒赤裸躺在船隻甲板上，這令他憶起兒時曾聽聞自己是出生在前往台灣船上的往事，於是他決意前往台北。在洋一抵台後與叔父的互動敘事中，三良進而藉由叔父對洋一的「開示」與洋一對叔父的「宣言」，揭示洋一昔日雖患有「狂熱

⁵⁷ 詩人向井孝將反戰詩分為三階段，最後一個即為此境界。內海昭(1983)『花と反戦の詩人・内海信之の生涯』、東京：日貿出版社、p.77。

⁵⁸ 川合三良(1941)「私信」、『文芸台湾』第2卷第3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p.23-24。

病」，今則欲藉由來台，讓自己「テンシン」(tensin)：轉心、也轉身；另在洋一與叔父於酒席間的「禪問答」後，三良也安排令洋一重燃鬥志，並不斷在心中吶喊「一定要重生！」的橋段。⁵⁹

回到〈婚約〉，三良除了在次男一角中置入自身的赤化與轉向經驗，也透過澤田在上海野戰醫院向「我」暢談體己話的橋段處於澤田一角中置入「反抗」基因，即算命老人對澤田說其「個性太好強，反抗心太旺盛，得壓一壓」的敘述，(〈婚約〉p.77)但相關書寫僅止於此。且前已提及，儘管三良將赤化與轉向元素置入次男一角，但次男並非主角，僅為酒井家世背景敘事之一。此一書寫策略或許是三良在轉向過程中「左」「右」為難下的權宜之計。

其實在三良的至親好友中，也有不少與他立場相近的人，例如其妹弘子(1913-1992)也熱衷地下普羅運動，兩度遭檢舉、逮捕。⁶⁰三良之弟四良在戰前也曾加入日本共產黨，亦曾被捕。⁶¹另外，好友內海繁的父親內海信之實為明治年間的人道反戰詩人，⁶²尤其，信之的反戰詩雖正面衝撞明治時期種種社會障壁，卻受到時代的侷限，最終走向封閉。⁶³對此，長子內海繁應有深切的體悟，而這也使得前述內海繁對於〈婚約〉的評價更添啟示性。

久野収・鶴見俊輔《現代日本思想》(《現代日本の思想》，1998)一書在論及日本超國家主義即昭和維新的思想時，曾在提及日本共產主義的敗退過程的脈絡下觸及轉向與戰爭協力之間的關係，指出在取締當局採取的強制轉向政策下，轉向派為戰爭勢力利用的情形。⁶⁴鶴見俊輔在論及戰時日本的日常生活時也指出，從極左轉到極右的傾向乃是當時極具代表性的潮流之一。⁶⁵但以〈婚約〉為例，三良雖透過文本「宣示」轉向，並透過置身戰場的澤田「視死如歸」的「宣示」，

⁵⁹川合三良(1941)「或る時期」、pp.15-16。

⁶⁰燎原社編集部(1998)「いちりんの花——福田弘子八十年の軌跡より——」、『燎原』(京都の民主運動史を語る会会報)第119号、京都：燎原社、pp.2-4。

⁶¹松尾教史前掲論文、p.307。

⁶²內海昭前掲書、p.79。

⁶³內海昭前掲書、p.77。

⁶⁴久野収・鶴見俊輔(1998)『現代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p.171。

⁶⁵李永熾譯、鶴見俊輔著(1983)『日本精神史』、台北：學生書局、p.123。

勾勒時局所需的理想日本人形象，但相關書寫僅止於此。

其次，在〈出生〉中，雖然三良最終提出符合時局理想的日台人形象，但全文極大篇幅卻是在控訴戰爭的傷痕。〈出生〉中的主角洋一是一名「光榮負傷」的「歸還兵」。回到台北後，洋一對景物依舊的城市感到格格不入，還染上瘧疾發高燒，情緒焦慮。經長期服藥與參加町內為「歸還兵」舉辦的歲末歡迎會才漸好轉，但仍有後遺症。過程中洋一在面臨難以與戰場經驗切割的現實面時，時而抗拒、時而隨波逐流。另外，洋一起初排斥「歸還兵」身份，最終仍到達「與人為善」的體悟。小說尾聲一對「本島人」兄弟登場，三良透過形塑「國語」（Kokugo）流暢的弟弟曾清福、哥哥阿德（洋一的戰友，兩人惺惺相惜）等角色，勾勒「內台融合」景象。最後洋一瘧疾痊癒，妻子誕下健康男嬰，洋一也收到在鄉軍人分會邀請出席志願兵制度實施祝賀會的通知。小說就在洋一邀清福同行，清福急切詢問報名事宜、洋一告知其明年滿十八即可報名後，清福凝望洋一的綁腿的場景中落幕。如是，文本在大篇幅控訴戰爭傷痕後，也「不免俗」地於尾聲處營造走出戰爭傷痕的「新生」（出生）意象，呼應著國策。⁶⁶

另外在〈轉學〉中，雖然主角洋一（灣生）在「內地」被同學蔑稱為「生蕃」，遭遇「內台融合」的挫折；且作者也透過導師之口，以「生蕃也是了不起的日本人」反擊，⁶⁷與當時總督府在台實施的皇民化連動，但文本乃旨在書寫「在台內地人」對台北的故鄉認同，是作者「某自敘傳的一部份」；⁶⁸且作者也同樣透過洋一的班級導師之口，主張「在台內地人」也與日本本土的日人同為一家人。可見在三良前述同質化原住民的言說中也存在對原住民不被認同為「日本人」的理解與同情。加以三良曾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提到其昔日的（反帝、左翼）思想並未（隨著轉向）消失殆盡；以及在散文〈三橋町墓地〉中也流露出人道主義的厭戰、反戰思想。無論如何，從三良來台前歷經赤化、轉向後被派往戰場的事實看來，三良確實「為戰爭勢力所利用」；且在

⁶⁶川合三良（1941）「出生」、pp.62-71。

⁶⁷川合三良（1941）「轉校」、p.97。

⁶⁸川合三良（1941）「轉校」、p.102。

三良的台灣作品中，也確實存在順應時局的面向。然而透過下列三良在「戰中的挫折時代」寫給弟弟的短歌可知，彼時的三良亦確實仍存有厭戰與反抗之思想；且從中亦可窺知其在亂世中的自處之道：

「吾弟啊！毋需悶悶不樂，咱自有咱的生存之道。荒謬的時代何需悲歌，不厚顏活著豈非損失。拿出昔日你我爭吵時的血氣之勇，有話就說，勇往直前，在這禁錮的年代，你至少可以對我。」⁶⁹

由此觀之，三良作品中出現的呼應時局的面向，或為其在「荒謬的時代」下「厚顏活著」的「明哲保身之道」。與此相關，本文接著也將嘗試透過三良在戰後的文學運動與社會運動參與動向、以及三良在戰後初期為數不多的反戰及台灣書寫等視角，趨近三良的核心思想。

6.從川合三良到高田三良：戰後三良的日本民主主義文學同盟運動與社會運動參與動向及反戰書寫、台灣書寫

戰後三良返回等同其第二故鄉的岡山，⁷⁰爾後並先後於岡山的山陽女子高校、兵庫縣立浜坂高校、豐岡高校任教，並繼承改姓高田。另如前所述，三良在六〇年代成為但馬地區民主文學運動的核心人物，擔任「日本民主主義文學同盟但馬支部」負責人，發行過《但馬新文藝》（《但馬新文芸》，1964-？）。由於《但馬新文藝》所藏不明，筆者僅能透過該誌及創刊號的相關介紹得知，該誌為成立於一九六三年的「但馬現實主義研究會」的機關誌，創刊號內容深具現實主義與社會批判風格。⁷¹而此與當時日本民主主義文學「展望社會的民主性發展方向，真實描寫各種對象」⁷²的本質亦頗為相符。

其次，從三良晚年於居住地浜坂帶領住民發動阻止火力發電廠設置計畫的抗議行動可知，戰後的三良仍熱衷於社會運動。另外，三良曾就日本戰敗主題撰文提及「戰前戰中的回憶與今後的覺悟」，其中之

⁶⁹內海繁指出，雖然這篇「作品年代不明，但可確定是它確實是寫於戰爭中的挫折時期」。內海繁編前揭書、p.149。另外，這篇短歌的中譯出自筆者（原文無句讀）。

⁷⁰內海繁編前揭書、p.229。

⁷¹堅田精司（1954）『『但馬新文芸』創刊号』、『兵庫史学』第41号、兵庫：兵庫史学会、p.25。

⁷²日本民主主義文學同盟編（1981）『民主主義文學運動の歴史と理論』、東京：青磁社、p.374。

於本文最重要的是，其曾「在抵抗運動極為激烈的間島地方的討伐軍中認真思考過脫逃一事」。⁷³與此相關，在三良寫於戰後初期的〈第一個早晨〉中也出現二戰末期台灣北部山間「義勇奉公隊」某中隊的台籍兵與日籍中隊長成功掩護彼此短暫逃脫軍營返家的情節。⁷⁴

另外，從三良寫於戰後四〇年代末期以反納粹・反戰的寫實主義與人道主義德國畫家凱綏・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1867-1945）為反迫害、反壓迫、反戰與關懷社會底層奮鬥一生的內容為骨幹的短篇小說〈憤怒的畫家：素描風（怒りの画家—スケッチ風に—, 1949?）〉中，亦可管窺其對柯勒惠支思想的推崇。⁷⁵另外在〈第一個早晨〉中，三良也揭露對日本戰敗後軍中自殺風潮的反感，並透過日本投降後對未來不安並畏懼台人報復的日籍兵及反之對日人敦厚以待的台籍兵一家的形象之書寫，拆穿「內台融合」的假面，彰顯台人的善良、樸實、情義與氣度。在散文〈美麗之島〉中，三良也回憶兒時常在台北街頭目睹日警荷槍率領「歸順蕃」在都市觀光的畫面，以及某次因好奇而尾隨其後遭斥，彼時深感日警遠比他平日被灌輸的「會出草、引發騷動的壞人」的原住民形象來得可怕的兒時記憶。⁷⁶

7. 結語

自解嚴以來，以及自九〇年代中後期垂水千惠打破民族藩籬，主張由台灣人創作的以中文與日語寫就的文學以及由在台日本人所創作的文學皆屬「戰前台灣文學」、中島利郎與河原功共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問世以來，已歷時數十載。然而有關在台日本人作家作品的討論，卻仍有待進一步從對非主流作家作品的檢討來充實與提升。目前少數論及川合三良〈婚約〉者（內海、安本、葉、松尾、中島），大多指出其與頌揚戰爭無緣的面向（內海、安本、葉、中島），其中亦有論者進一步指出其具有反戰的積極意義（葉、中島），唯相關評論僅寥寥數語，無法具體彰顯〈婚約〉的反戰與厭戰的時代性意涵。

⁷³內海繁編前揭書、pp.193-194。

⁷⁴內海繁編前揭書、pp.33-39。

⁷⁵內海繁編前揭書、pp.81-87。

⁷⁶內海繁編前揭書、p.78。

本文首先透過文本中對於戰時下後方的日常、從容及幸福閒適的生活之書寫如年輕人對流行時尚的追逐、對音樂與運動及電影等嗜好的追求、以及相親與約會及婚約等日常生活中的幸福事件與支撐這些日常與幸福生活的家、鐵工廠、畫廊、餐廳、博物館、車站等城市空間，以及與此對置之置身前線此一非日常生活場域中的士兵的內面葛藤之書寫，嗅出作者對於戰爭導致生活變調的詠嘆。另並透過文本中對於野戰醫院中澤田的日常回想書寫考察，看到作者試圖將戰爭導致美好日常斷裂的戰爭的殺傷力前景化，藉此控訴戰爭的壓迫。

其次，本文並透過對文本中澤田戰死與聽聞澤田死訊的酒井從失望、氣餒到堅強（尊貴化）的心境轉折書寫，主張作者一面形塑符合時局所需的具「名譽戰死」覺悟的士兵形象與堅毅的後方形象；一面宣告日常與幸福生活的破局，藉此間接流露厭戰與反戰思維。而此一思想亦可從「我」來到戰場後對酒井、台北、後方深深眷戀的這種反向操作的書寫策略中窺知。唯在如此書寫後，作者卻朝向配合時局所賦予戰時下理想的日本人應有的視死如歸的覺悟之方向結尾，唯筆調頗為克制。本文主張，正是這種無論表達反戰・厭戰或迎合時局都點到為止的書寫策略，構成了〈婚約〉的基調。而這或許正是「文藝台灣賞」初選委員認為〈婚約〉等作缺少氣魄、力道不足、似未完全發揮、另寓深意之故。同時，這也可能也是三良在歷經左翼運動、受拘禁、轉向，實則未全然捨棄其既有理念，但在「荒謬的時代」與「禁錮的年代」下，須先求「厚顏活著」的權衡之計。

另外，本文也從三良的赤化、轉向與戰地經驗及三良在滿州與台北的書寫等視角，考察三良的戰爭觀，從中窺知三良對戰爭與時局的厭惡與反抗，以及三良在亂世中的自處之道。另外，從三良回到台北後所書寫的散文與書信文當中，亦可見其對戰爭發出「將身邊日常的厭戰感情血肉化的」、「和平主義式的、詠嘆的」感慨，以及其自身有關未全然捨棄既有思想及相關書寫實踐的自白。據此，〈婚約〉中與故事主軸無直接相關的次男的赤化、轉向等敘事則宛若「保護傘」。在此

同時，〈婚約〉也以「靜謐的抵抗」之姿，⁷⁷表達其對戰爭的立場。而這可能也是葉石濤認為文本「有那麼一丁點兒的反戰思想」之故。否則，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台灣即將實施志願兵制度的時局下，〈婚約〉等作應無獲獎的道理。

尤其，「文藝台灣賞」的設立，乃旨在促進樹立台灣的日本南方文學，⁷⁸是而，〈婚約〉等作會獲獎，絕非源自評審對於厭戰・反戰的共鳴，而極可能是因為其具有與時局高度連動的面向使然。尤其三良是當時台灣少數具戰場實戰經驗的作家；且〈婚約〉發表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文本中前線士兵的對話場景與前線・後方互為支援方的書寫，也與國策呼應。另外，〈轉學〉在書寫「灣生」在日遭遇「內台融合」的挫折並從中確認「灣生」對於台北的故鄉定位之餘，也觸及日原的同質性。〈某個時期〉展現轉向、重生的意志。而〈出生〉則在大篇幅的日籍歸還兵的戰爭創傷與療癒過程書寫後，藉由台籍青年對志願兵徵召制度的積極響應與日籍歸還兵展現經驗分享意願的協助形象之書寫，與國策呼應。⁷⁹

最後，本文也透過戰後三良的日本民主主義文學同盟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參與動向與反戰書寫、台灣書寫實踐等考察，從側面窺探三良的思想脈絡，看出三良並未因宣言轉向而被成功洗腦為極右派。這既呼應了戰前三良在書信文〈私信〉中有關其昔日思想未全然消逝的「自述」，也呼應了本文對於〈婚約〉中的澤田在向「我」傾訴與酒井的幸福日常因戰爭破局後，突然激昂吐露儘管如此他「並不想活著回去」的唐突之理解。

目前有關戰前在台日本人所創作的「台灣文學」之研究仍極待充實。以三良的例子而言，除了本文所提及的作品外，尚有許多未出版者。另外，三良與濱田隼雄同為戰前台灣文壇中少數具有戰場經驗的

⁷⁷中島利郎前揭書、pp.20 6-248。

⁷⁸文芸台灣社（1942）「文芸台灣賞第一回受賞者發表 社告」、『文芸台灣』第4卷第3号、台北：文芸台灣社、p.26。

⁷⁹這也符合「戰陣訓」中「若得萬死之一生，沐歸來之大命，應詳致思於護國英靈，慎言行，為國民之範，益加堅守奉公之覺悟」之規條。東條英機頒布（1941）「戰陣訓」、『親民』第6卷第2号、台南：台南州自治會・共榮會、p.8。

作家，本文主要分析的〈婚約〉以及本文論及的〈出生〉，也都具有「戰傷文學」之面向。未來透過相關作品與相關主題的深入比較考察，不僅有助於深化對於三良作家思想軌跡的理解，亦有助於探究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多元及多義性。

參考文獻

中文

- 李永熾譯，鶴見俊輔著(1983)『日本精神史』，台北：學生書局。
- 葉石濤(1997)〈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總序〉，收入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3，台北：遠景出版，pp. 7-35
- 葉石濤譯，垂水千惠著(1995)〈戰前的台灣文學——與日本的糾葛中透視〉，收入葉石濤編譯(1996)《台灣文學集①——日文作品選集》，高雄：春暉出版社，pp. 21-29

日文

- 板垣直子(1943)『現代日本の戦争文学』、東京：六興商会出版部。
- 上田光輝(1939)『皇民読本』、基隆：淨土宗青年聯盟。
- 内海昭(1983)『花と反戦の詩人・内海信之の生涯』、東京：日貿出版社。
- 内海繁編(1973)『ひとすじの道—高田三良の作品とその生涯—』、神戸：高田良介發行。
- 内海繁(2007)「ひとすじの道——高田三良の生涯」、『燎原』第169号、京都：燎原社、pp. 5-8。
- 燕城(1938)「小感」、『竹鷄』第9卷第12号、台中：竹鷄吟社、pp. 3-5。
- 王碧蕉(1942)「台湾文学考」、『台湾文学』第2卷第1号、台北：啟文社、pp. 21-24。
- 大澤貞吉(1941)「川柳随筆 葦平氏と河童」、『川柳国姓爺』、台湾：台湾川柳社、pp. 8-9。
- 岡田三郎(1939)「戦争文学の行方」、收入(2007)『文芸時評大系 昭

- 和篇 I』第十六卷 昭和十四年、東京：ゆまに書房、pp. 390-393。
- 尾崎秀樹（1971）「決戦下の台湾文学」、重引自陳明台（1997）〈論戰前在臺灣的日本人作家和作品〉，收入《臺灣文學研究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pp. 137-152。
- 川合三良（1941）「転校」、『文芸台湾』第2卷第2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p. 94-102。
- 川合三良（1941）「私信」、『文芸台湾』第2卷第3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p. 22-25。
- 川合三良（1941）「或る時期」、『文芸台湾』第2卷第4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p. 8-21。
- 川合三良（1941）「出生」、『文芸台湾』第2卷第6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p. 62-71。
- 川合三良（1942）「婚約」、『文芸台湾』第3卷第4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p. 71-80。
- 堅田精司（1954）「『但馬新文芸』創刊号」、『兵庫史学』第41号、兵庫：兵庫史学会、p. 25。
- 川村湊（1990）『異郷の昭和文学』、東京：岩波書店。
- 久野収・鶴見俊輔（1998）『現代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
- 黄得時（1942）「輓近の台湾文学運動史」、『台湾文学』第2卷第4号、台北：啟文社、pp. 2-15。
- 黄得時（1943）「台湾文学史序説」、『台湾文学』第3卷第3号、台北：啟文社、pp. 2-11。
- 台湾語通信研究会（1939）「歳暮漫言」、『語苑』32卷12号、台湾：台湾語通信研究会、pp. 65-68。
- 台湾總督府文教局学務課（1940）「陣中美談 輝く荒鷺精神——畏くも上聞に達す」、『輝く日の丸』、台北：台湾總督府文教局学務課、pp. 4-7。
- 台湾婦人社（1939）「時の話題 ペン従軍作家は一体どの位稼ぐか」、『台湾婦人界』、台北：台湾婦人社、pp. 100-101。
- 東条英機頒布（1941）「戦陣訓」、『親民』第6卷第2号、台南：台南

- 州自治会・共栄会、pp. 2-28。
- 中島利郎・河原功編(1998)『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日本人作家作品集』、東京：緑蔭書房。(全五巻・別巻一)
- 中島利郎(2013)『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日本人作家の系譜』、東京：研文出版。
- 日本民主主義文学同盟編(1981)『民主主義文学運動の歴史と理論』、東京：青磁社。
- 濱田隼雄・龍瑛宗・西川満(1942)「鼎談」、『文芸台湾』第4巻第3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p. 28-36。
- 火野葦平(1938)『土と兵隊』、東京：改造社。
- 火野葦平(1939)『花と兵隊』、東京：改造社。
- 火野葦平(1939)「華麗島を過ぎて」、『華麗島』第一号、台北：台湾詩人協会、pp. 5-7。
- 日本共産党兵庫県委員会(2011)「日本海岸(但馬・丹後)の原発計画くいとめた40年前の運動に学ぼう：日本共産党但馬地区常任委員中家貞雄さんに聞く(上)」、『兵庫民報』Web版、<https://hyogominpo.blogspot.com/2011/08/40.html>
- 文芸台湾社(1942)「文芸台湾賞第一回受賞者発表 社告」、『文芸台湾』第4巻第3号、台北：文芸台湾社、p. 26。
- 松尾教史(2009)「台湾時代における川合三良の文学作品—ある在内地人作家にとっての皇民化政策—」、『Core Ethics』Vol. 5、pp. 305-314。
- 楊雲萍(1942)「台湾文芸界この一年」、『台湾時報』276号、台北：台湾時報社、pp. 54-61。
- 吉村敏(1944)「たしかな裏づけ：山の勇士の遺族を訪ねて」、『新建設』3巻9号、台北：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pp. 40-44。
- 燎原社編集部(1998)「いちりんの花—福田弘子八十年の軌跡より—」、『燎原』(京都の民主運動史を語る会会報)第119号、京都：燎原社、pp. 2-4。